

奔走抗战前线的林可胜医生

□ 杨 娜



林可胜，祖籍中国福建，1897年10月15日出生于新加坡，16岁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20—1924年先后获哲学、生理学和科学博士学位。1924年，林可胜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次年成为学校首位华人系主任。他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主持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推动我国生理科学实现飞跃式发展。林可胜以精湛的医术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蜚声海内外，被誉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更为可贵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林可胜毅然放弃安稳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成立救护总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林可胜临危受命担任总干事。1938年春，林可胜在汉口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出任队长，他改变以往在大城市设置伤兵医院的做法，而是派出医疗队深入战地随军救护。过去伤兵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轻伤转重、重伤致死的情况大有改进，部队士气大大提升，战斗力得到有效保障。随着战局日益严峻，救护总队先迁长沙，继迁邵阳，1939年3月落址于贵阳图云关。那里原本是一片荒芜的山谷，林可胜与队员们一起平整土地、修建医院以及材料仓库等。他还积极募集资金和医药器材，在其任内共募得捐款6600多万美元，极大提升了救护总队的战地救治能力。救护总队全盛时下辖150支战场救护队，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多达3420人，拥有救护车200多辆，是抗战时期全国的医疗救护中枢。

中国共产党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十分重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指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林可胜建立联系。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成立，在救护总队积极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救护总队迁至图云关后，中共红十字会支部进一步壮大，发展党员20余人，充实和加强了救护总队的进步力量。

1939年，红十字会党支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委员会，明确总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队长，在医务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十字会书报供应站”，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动员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到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大多数医学专家、医护人员的认可。

大力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红十字会支部和总支委员会的宣传动员下，林可胜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战地救护工作中，除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以外，林可胜也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派遣医疗队、赠予医药物品，有效改善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救护条件，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底，周恩来请求救护总队协助八路军开展当地的医疗卫生救护工作，林可胜立即派出第7、第23、第39医疗队带着药品和器械奔赴西北。在陕北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第23医疗队完成各类大小手术3000余台，无一死亡病例，受到边区政府的高度赞扬。当该队奉命调走时，周恩来、朱德亲自前往送行。1938年，林可胜主动派遣两个医疗队、一个医护队和一个X光队前往延安，为八路军开展战地救护服务，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同年秋，林可胜亲自带领4支医疗队到延安等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称赞。林可胜还派遣国际援华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求恩、柯棣华等都经由他派赴边区服务。

林可胜还积极援助新四军的医疗工作。1937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四军缺少医务人员，此时林可胜正在组建救护总队，他将自己手里志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的医生名单交给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沈其震从中挑选了一些有战伤救治经验的医护人员，组建起新四军的第一支医护队伍。1939年秋，沈其震再次来到贵阳图云关，希望林可胜能提供医药支援。林可胜按照沈其震递交的申请单加倍拨发药品，包括当时极为缺乏的奎宁片(抗疟疾药)。他还派遣两支医疗队前去支援新四军。这些医疗援助对新四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培训中国军医人才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林可胜领导下的救护总队对共产党的支援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被指控为“亲共”。蒋介石责怪林可胜“左倾颇甚”“阴助延安”。1942年，林可胜辞去救护总队队长职务。同年，由于在中国生理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

1944年底，林可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医署署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创办国防医学院，大力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1946年，沈其震随叶剑英赴北平参加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代表团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得知林可胜正在北平视察军医工作，沈其震向叶剑英请求去看望林可胜，叶剑英当即批准并表示，“像林可胜这样同情我军的爱国将领，在国民党军队里比较少见，我也应当去拜访他”。双方会面后，叶剑英对林可胜在抗战时期大力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表达了敬意与感谢。

1948年，林可胜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蒋介石拟任命林可胜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被他拒绝。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命令林可胜迁台，他表面答应，实际并未去台湾任职，而是移居美国，先后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在生理学药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1969年7月8日，林可胜因患食道癌逝世，终年72岁。

2021年9月10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其新命名的“可胜大楼”揭牌，此举不仅是向林可胜在中国生理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致敬，更是因为他为中华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缘起和作用

□ 乌力吉

冷战期间，中美两国从1955年至1970年曾在没有外交关系的状态下先后在日内瓦和华盛顿进行了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大使级会谈。在中美相互隔绝、充满敌意的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尽管会谈没有达成解决双边关系实质性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它对中美双方减少误解误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两国关系在1970年代初的破冰解冻积累了条件。

中美大使级会谈缘起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中美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美国政府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运用政治、外交等各种手段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等。但是，中国已经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一个政治大国，对亚太地区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回避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是不现实的。这是美国不得不与中国谈判的根本原因。

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提出愿意斡旋中美代表会谈，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立刻向中共中央提出与美方接触和谈判的建议，很快获得批准。1954年6月5日至6月21日，中美两国代表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尽管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双方商定从9月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

领事级会谈一直持续到1955年7月15日，共进行了17次。谈判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却为后续大使级谈判创造了条件，成为中美两国官方接触的开端。

1955年7月，在英方的斡旋下，中美决定将会谈从领事级升为大使级。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的国联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

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双方就议程达成一致，即先解决平民回国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其他问题。第一阶段从8月1日至9月10日，历时40天，共会谈了14次，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有关平民回国的协议。该协议的达成直接促成了包括钱学森、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在内的130多位科学家回到祖国，他们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5年9月20日，会谈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并不断在已经解决的第一个议题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致使会谈寸步难行。美方甚至在1957年12月的第73次会谈中，提出由不是大使的官员与中方会谈。对此，中方表示不再继续与美方谈判。美国单方面降级的行动使中美会谈从僵局倒退到中断。1958年9月15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盛顿恢复，但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对此，周恩来曾在19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评价道：“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控制危机升级，防止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一个“缓冲器”。中美在台海地区的紧张对峙是中美关系的主要症结和核心矛盾，也是中美大使级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关键障碍。自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基地。1953年2月，刚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美国将不再对台湾海峡实行“隔离”政策，开始实行所谓的“放蒋出笼”，鼓励和支持国民党军队对

中国大陆的军事攻击和袭扰。20世纪50年代爆发了两次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为直接军事冲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美大使级会谈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使双方能够了解彼此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这一作用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福建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炮击。随后美国立即加强了在台北地区的军事部署，但美国也担心被拖入到战争中。艾森豪威尔政府于9月4日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防御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时表示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准备恢复中美会谈，以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战争挑衅，同时宣布鉴于美国已经指派了大使级代表，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间的大使级会谈。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盛顿恢复。在会谈中，中方了解到美国企图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从而造成两岸分离永久化的图谋，故中方做出了不攻占金、马的决定。此外，中方也向美方表明，不承认任何外国势力有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反对任何有可能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

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积累条件。1970年2月20日，最后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之后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展，中美共同决定华沙渠道不再使用，大使级会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中美关系的作用时，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双方在会谈中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其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基辛

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中美大使级会谈是“无效的”，并且“说不出一项成果来”。在他看来，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是绕过大使级会谈出现的，因为尼克松政府将主要问题从台湾问题转向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问题，即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美双方在十多年共同限制危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互动中，已经建立起最低限度的互信。这种互信的建立既有赖于信息传递渠道的建立和有效运转，也需要时间对彼此的外交承诺或意图进行验证。因此，如果没有大使级会谈这个信息沟通渠道和长时间的谈判交锋，中美有可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诸多危机中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不可能实现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

中美双方曾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传递信息，消除了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一次危机。1962年，台湾蒋介石当局正准备利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局面，实行“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指示王炳南紧急约见卡波特，向美通报这一情况，并要求其对此明确表态。美方当即表示，根据“现存条约义务”，蒋介石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不能对大陆采取进攻性行动，而美国对这种行动不会给予支持。这是美国在1954年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时要求蒋介石作出的承诺。这次事件表明，美国并不愿为了蒋介石而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摸清美国的底牌，有利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龙”字：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识

□ 隋云鹏 隋汉武

“龙”是中华民族图腾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也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在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拥有庞大的神话家族和广泛的民俗信仰。在神话中，“龙”威武刚健、神通广大、变幻莫测，能够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无坚不摧。因此，“龙”字寓意刚健、强大、威武、文明，构成了龙马精神、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等诸多美好词汇。今天，随着考古学材料的不断丰富和古文字研究的深入，“龙”字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密码的事实日渐清晰。

现有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拥有约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距今1万年前后，文化、天文历法学与农业相伴而生。农业的兴起需要天文历法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出于对天人关系（天文与人文关系）的思索，文化也随之兴起，“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距今55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先后进入农业社会，文明、国家也随之相伴而生，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个地区的社会上层普遍形成了龙崇拜。可见，农业社会、国家、文明与龙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古人对于这一内在联系有着深刻认识。“文明”一词来源于“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的“田”字既可指田地，也可指天田星，而

“龙”字指东宫苍龙星宿。

“龙”字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密码，是因为“龙”字的本义是东宫苍龙星宿，商周古文字中的“龙”字是东宫苍龙星宿的象形，而东宫苍龙星宿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授时主星和主要历法标志物。东宫苍龙星宿中的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也均为授时星象和历法标志物，被先民用来观测时间和节气以指导农时。冯时先生认为，《周易》乾坤两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东宫苍龙星宿，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等卦爻辞实际上描述了“公元前二千年黄昏之后所见的天象”。可见，《周易》是全面总结上古以来天人关系的学说，不愧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每一次历史性突破都要向它回溯，寻求理论依据、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

东宫苍龙星宿作为先民的授时星象和历法标志物，有一条异常久远的考古学线索。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龙形堆石和龙纹陶片；距今8000年至7500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两条猪首龙，龙首为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弯曲的躯体；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发现蚌龙，其造型形似鳄鱼。早期龙的形象普遍比较简单，弯曲的龙身是比较突出的特点，这是为了模拟东宫苍龙星宿回天运行的形

象，后来发展为太极图（河图、龙图）。

从红山文化开始，造型精美的玉龙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华文明玉文化与龙文化的完美融合。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显示了自己与星象之间的密切联系，龙首为马首造型。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陶寺早期都城遗址，发现了彩绘龙盘，龙首为鳄鱼头形象，龙身为赤链蛇身造型。二里头遗址发现具有王者风范的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成，长约64.5厘米。由于陶寺古国为“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为最早的广域王朝的都城，它们思想精微、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龙形象是史前时期多元龙文化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深刻影响了后世历代王朝以“龙”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礼乐文明、制度文明。

文明以止，龙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充分体现了文明具有相对稳定、不变的特质。如前所述，龙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东宫苍龙星宿是农业社会的授时主星和主要历法标志物。中国农业社会主要由南方稻作和北方粟作两大农耕体系构成，稻和粟均为秋熟作物，有着大体相同的生长周期。农作物生长需要雨水，东宫苍龙星宿于黄昏逐渐显现预示着雨季的来临，这一授时知识是整个农业社会运转的核心，是农业文明的核心密码，也是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中国中东部地区普遍接受龙崇拜

的原因。可见，大禹治水、商汤祈雨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而大规模灌溉网的规划和建设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和重要职能，良渚古国庞大的水利工程即是明证。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其王朝最高统治者都毫无例外的继承了这一政治文明，垄断着东宫苍龙星宿的授时知识，自称为“真龙天子”，向天下宣示，只有他能民众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以龙为主要标志物和意识形态，构建了等级制度、分封制度、舆服制度、旌旗制度、棺槨制度等礼乐文明、制度文明，以神化政权、巩固统治。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龙”字的本义日渐淹没在历史深处，龙文化也褪去了其神秘主义的外衣，成为文学中的神话，但是，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不能忘记祖先筚路蓝缕、朝乾夕惕的历史功绩。他们把历经艰辛所总结出来的知识和经验，用最尊贵的方式和标识传承下来，一遍遍地告知我们，可谓用心良苦。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元亨利贞、进德修业、含弘光大等人生观，依然在为我们的人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明密码，激励着我们努力创造新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走出一条新路。

